

# 毛共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 · 上 ·

汪學文

## 一 文革期中毛共的知識份子政策

大陸知識份子問題，對於毛共來說，是一個具有長期性和普遍性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難以解決而又不得不處理的問題。

十餘年來，雖然毛共給予知識份子的是厄運、是浩劫，而知識份子所帶給毛共的却一直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困擾和迷惘；因此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也始終搖擺不定，時寬時嚴，或左或右，數度變易。但是，無論是探懷柔政策還是高壓政策，都沒有使知識份子澈底投降屈服，為其所用；不但老知識份子如此，甚至毛共自己所哺育的新知識份子也「打着紅旗反紅旗」，紛紛作有形或無形的反抗。

因此，毛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固然是要打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奪權鬥爭；另一方面則要打擊所謂「反動學術權威」，並批判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以解決知識份子問題。這一點，匪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早即指出，並認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它說：「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註一）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從文化的觀點看來，是由「思想批判」和「教育革命」導發的，現在毛共在大陸二十九個省級「革命委員會」建立之後，重新強調「教育革命」問題和「知識份子改造」問題，足見在毛匪澤東的心目中，這兩個問題仍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

毛共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共的文化打手姚文元曾經發表三篇政策性的文章，而這三篇文章都涉及知識份子問題：

第一篇是五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戰，而且更是打擊老知識份子的訊號。其打擊的主要工具，最初是匪軍，「解放軍報」首先轉載這篇文章，並發表編者按語，指「海瑞罷官」為「毒草」，就是明證。及「紅衛兵」誕生，立即參加打擊工作，並成為主力，揚言要「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註二）。這就是說，在這個階段，毛澤東先以匪軍打擊老知識份子，繼則又以新知識份子猛攻老知識份子。

第二篇是五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平「人民日報」發表的「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文章表面上雖係以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及「思想、感情、文采」兩本書為批判對象，但是，據毛澤東說：「此文的要求是點破『五、一六』（註三）。所謂『五、一六』，就是『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它代表着一股「極左思潮」，也代表着一羣青年知識份子的反毛心聲。姚文元說：「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份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按即「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颯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澈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這是整肅「紅衛兵」的訊號，也是打擊新知識份子的開始。「五一六兵團

「旋即遭到整肅，首要份子王力、戚本禹、關鋒、林杰等均被扣押；接着，其他各地的「極左派」，亦紛紛遭到鎮壓。而打擊這些新知識份子，又是以匪軍作為工具。

第三篇是五十七年八月在毛共「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篇文章首先指出：「一個偉大的鬥、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最新指示的發表，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進學校和其他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是這個高潮到來的信號。這個高潮，是經過成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後出現的，它將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這幾句話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打擊一切知識份子（包括所有老知識份子和新知識份子在內）的宣戰書；接着，姚文元傳達毛澤東的所謂「最新指示」說：「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羣衆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註四）這段話明確地規定，打擊知識份子的工具除仍由匪軍外，另增加工農份子，以便於全面打擊，並藉以擴大打擊的效果。

從姚文元的這三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始終以知識份子為敵，而且不論是老知識份子還是新知識份子，都是打擊的對象。

## 二 知識份子再教育的背景

毛共「紅旗」雜誌於五十七年第二期，除發表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外，還刊登了一篇由「文匯報」記者和「新華社」記者聯合撰寫的題為「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前者是從政治方面強調知識份子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後者則從技術方面強調工人出身的技術員比大專院校畢業的技術員「思想較前進，實際工作能力較強

」。

接着，「紅旗」雜誌於第三期又發表兩文，一篇是題為「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的調查報告，「紅旗」雜誌在這個報告所加的編者按語說：「這裏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等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於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份子，都應是如此。」據毛婆江青指出：這個編者按語，代表了毛澤東的聲音（註五），可能就是毛澤東執筆的。另一篇是「人民日報」的「紅旗」雜誌以評論員名義聯合發表的題為「關於知識份子再教育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對於前一篇「調查報告」的編者按語大加發揮，並亦指其為毛澤東的聲音。前一篇於九月五日由「新華社」先行透露，後一篇於九月十一日始由「新華社」報導，同日另傳播毛澤東的一個「最新指示」說：「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澈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份子，工農兵是歡迎的。」這個補充性的「指示」，有兩個要點，一個是「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一個是「澈底改變舊思想」，這就是說，所謂「再教育」，就是要加強「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

毛澤東之所以要對知識份子實施「再教育」，其原因和背景大約如下：

### 第一、基於階級觀點的成見

共產主義者所謂之「知識份子」

，其含義與原意是有出入的，它不是從知識的有無或多寡去區別，而是以階級觀點去分析。它們認為「知識份子」的定義和性質是：

「社會上從事知識勞動的人叫做『知識份子』。他們底出身屬於各種不同的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他們並沒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因此不能稱為階級。但大體說來，知識份子以出身小資產家庭為最多。他們都是有知識的，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同時，在社會上，他們大半也是被壓迫者（當然不是最受壓迫的），因此，他們在一切革命運動中，尤其是在它底初期，往往

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又因為他們底社會出身關係，往往成了革命營堡中最動搖的份子。」（註六）

在這個定義中，共匪不僅對知識份子作了階級分析，而且尚表示出其對知識份子的評價，認為知識份子雖然具有利用價值，但却含有動搖性，並不可靠。這個教條，注定了共匪對知識份子要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

## 第二、基於知識論的偏見

共產黨人認為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要跟政治走；人類是為了進行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而需要教育的，而世界上的知識也只有兩門，一門是階級鬥爭的知識，另一門是生產鬥爭的知識。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他認為書本知識祇是前人總結實踐所為成的理論，不是學生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學生必須善於將這些知識應用到實際中去（註七）。換句話說，毛澤東重視實踐，輕視理論；重視感性知識，輕視理性知識。他認為感性知識乃源自實踐，理性知識僅是書本知識，僅是空洞的理論，因而偏重感性知識，強調經驗主義；輕視理性知識，反對「本本主義」。

同時，毛共認為知識份子所受的教育（包括「文革」前所受的教育），都是「資產階級教育」和「修正主義教育」，而這些教育，都是重視「書本知識」、主張「智育第一」、「分數第一」。因而「越讀越修」、「越讀越脫離羣衆」，以高中生言，普遍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現象（註八）；以大學生言，則普遍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穿破衣裳，四年急着找對象，五年畢業不肯下鄉」的現象（註九）。因此，毛澤東基於理論偏見和實際需要，乃決定由工農兵給知識份子以「再教育」，澈底改變他們的「舊思想」。

## 第三、基於知識份子的反共

知識份子雖然往往易於受共黨宣傳的蒙蔽，受共黨詐術的欺騙，但是宣傳祇能蒙蔽於一時，不能永久有效，而詐術也祇能欺騙少數人，不能誘惑所有的人；因為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份子，皆具有相當的歷史知識和世界知識，而且懂得使用「今昔對比」和「中外對照」的方法，從歷史的鏡子來看當前的問題，從世界人類文化的大流中，既生不了根，又立不住腳；同時，知識份子自由思潮的傳播者，也是自由生活的追求者。十餘年來，大陸知識份子無論是教學、寫作、言論各方面，都流露出對共黨極權統治的不滿，構成對毛澤東的威脅。因此，毛澤東

既仇視知識份子，又痛恨學校教育，要對學校教育進行「改革」，要對知識份子實施「再教育」。

## 第四、基於紅衛兵的覺醒

毛澤東對於紅衛兵的造反，特別是對於「當權派」的猛攻，起初不僅感到滿意，而且覺得很得意，但是不久就發現紅衛兵具有「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感到很失望。對於紅衛兵的「搖擺性」，早在五十六年六月間，毛共的報刊就展開批判，據謂：

「當前，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突出表現，是以『我』字為軸心，片面武斷，時『左』時右，好走極端，例如：

「自以為對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誰的話都聽不進去；對別人，只要和他的觀點不一，就斥之為『老保』，甚至隨意拉出隊伍，要踏平、砸爛對方的組織。

「在個人遭受壓抑時，他要反對，要鬥爭；一旦取得勝利，地位起了變化，外界壓力小了，特別是當他掌握了一部份權力以後，就以為革命到了底，於是就停頓下來，不再前進。

「在革命組織內部，獨行其是，一切通過『我』說了算數，大搞其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幾口水，便轉而鬧極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當起『逍遙派』。

「凡此種種，在一些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表現較為突出，他們不以為非，反而自稱為『革命行動』，或者叫做『造反派的脾氣』！」

而且，這時匪報就為整肅紅衛兵埋下了伏筆：「……他們由於本身存在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而又不願在鬥爭中進行艱苦的改造，只能在一段時期內充當革命的同路人。這種人，儘管也能幹一點革命工作，但每當革命深入發展，特別在轉折關頭的時候，他就停頓了，動搖了，甚至倒退了，最終被革命的車輪遠遠地拋到後面去。」（註一〇）這段話不僅是前述有關「知識份子定義」的公式的運用，同時預先暗示：紅衛兵的利用價值一旦消失，就要遭到「拋到後面去」的命運。

不久，毛澤東又發出「十八點最新指示」，其中第五點和第九點，分別對紅衛兵和知識份子提出批評，他說：

「現在的情況是（幹部）站出來就打倒，我們做事情是有人掛帥的。紅

基本立場所在：該文引述列寧對階級的分析時稱：「階級劃分是政治派別劃分的最根本的基礎，它歸根到底總是決定着政治派別劃分的」，在階級社會中，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並以黨派鬥爭的形式最充份的展開。政黨和政治派別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毛匪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以上這幾段話，說明了共匪對黨派問題是站在階級的觀點上來分析，來對待的，而不是以各黨各派的政見，以往賣身「功績」，或者各個黨派負責人的聲望等來決定的，既然是以階級為出發點，則除了能代表所謂「無產階級」（雖然實際上不盡善，但口號上是這樣講的）的共黨以外，即無其他黨派可以存在，在未消滅前，是所謂「黨外有黨」，如果有其他黨派亦代表「無產階級」來參加「革命」，這便成為「黨內有派」了，亦同樣不能存在，所以代表「無產階級」是共黨的專利，除了共黨專政外，並無其他黨派可以分潤。雖然共匪竊取政權以後，所有財富集於毛匪一身，實質上已經過着資本家的生活，但因為毛匪是共產黨，故仍代表「無產階級」，其餘各附庸黨派，如果認為自己未能代表「無產階級」，則其命運已早決定，要逃避滅亡的命運，祇有祈禱早日轉移共匪政權，如果想要改變共黨立場，是不可能的。

其次，毛匪對各附庸黨派的迫害、改造，亦有其一定的原則的，這個原則，可以說是共黨的基本矛盾因素之一，因為共黨一貫以「唯物史觀」為其分析事物物的消長，然而在政治鬥爭上特別着重精神上的批鬥，所謂「意識形態」的改造。毛匪曾經說過：「黨內的派性鬥爭，主要為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存在不同的階級，在各個階級內部，又存在不同的階層，各個階級和階層，在政治鬥爭中，都會有左、中、右各派的區分，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普遍規律。毛匪說：「除了沙漠，凡有人羣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這一「不斷革命」的理論，在今年十月卅一日的匪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中，又加強調，「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極其深遠的意義」。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大陸各附庸黨派由於階級成份與共黨不一致，注定了被整肅的命運，但另一方面，階級意識的改造，決不會因為組織的解體，而全部融於共匪，相反的，所潛存的思想意識形態，仍需要毛匪澤東作一萬年的不斷革命，才能完全消滅，當然，這個時間實在太長了，用不到推測的那麼久，不過仍需要長期的鬥爭，則是毛匪承認了的。如果各附庸黨

派潛存的反共意識，再作傳播與擴展的話，豈非更易激起共黨內部派系的動變，因而，作者認為我們對大陸附庸黨派的政治處境，應該從其潛在的意識方面來觀察，不要單以垂死的組織來分析。大陸附庸黨派份子，其中仍不乏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態，祇要能恢復中國士大夫應有的精神，並且將這些文化意識，傳播擴散，相信對我們的政治反攻，是有幫助的。古代歷史中多少暴君，企圖消滅人的意識，均沒有成功，最後還是落在人民的後面，宗教、藝術、文化、科學，這些人類智慧創造的結晶，是決不會毀滅的，除非負責傳播的人們，本身已喪失了意志，否則總能有繼往開來的一天的。大陸附庸黨派份子，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以後，祇有澈底覺悟，羣起反共，才有自由光明的前途，這是作者分析若輩政治處境以後的一點感想。

#### ——上接第51頁——

衛兵能掛帥嗎？今天上台，明天就會被打倒，正因為是他們政治上不成熟。……紅衛兵不行，沒有經過鍛鍊，這樣大的事情信不過他們。」「本來想在知識份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份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份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七年來，文化教育修正主義份子把持者，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血液中的，所以要革命的知識份子必須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的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註一一）因此，毛澤東要對老知識份子以及新知識份子，普遍實施「再教育」。

上述的四點，前兩點是理論問題，後兩點是實際問題。這四點恰好說明了毛共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基本矛盾：前兩點說明了毛共對知識份子的歧視，後兩點說明了知識份子對毛共的反抗。

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也許是因為「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血液中」，所以恨之入骨，始終強調知識份子應向工農學習，以打擊其自尊心，貶低其社會地位，並曾以「牆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之聯語，嘲笑輕蔑知識份子。在「文革」期間，大陸知識份子在「川反份子」（按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走資派」（按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國民黨特務」、「美國特務」、「蘇修特務」、「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等等罪名下，已經受盡屈辱、折磨、和迫害。如今在「再教育」的政策下，處境更為惡劣，「最近以來，有人不分青紅皂白，把所有的知識份子統統叫做『老臭』，有的人甚至把知識份子排列在①叛徒、②特務、③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④地⑤富⑥反⑦壞⑧右之後，說什麼『知識份子都是臭老九』。」（註一二）足見今日大陸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較之古代的所謂「九儒十丐」，更卑賤低下！